

日不落帝国的崩溃

——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

李安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可以说是世界当代史最重要的事件。它是进步战胜野蛮、正义征服邪恶的标志，同时为人类历史“殖民化”这肮脏的一页划了一个句号。近年来，随着英国 30 年前官方文件的解密，史学界对非殖民化的研究进一步展开。本文拟运用近年公开的英国官方档案资料，对大英帝国的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作一探讨。^{*}

为了更好地理解非殖民化问题，有必要将英国殖民史的大致轮廓作一勾画。概要地说，大英帝国的兴衰史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成型阶段（1558—1815 年），扩张阶段（1815—1914 年），衰落阶段（1914—1945 年），崩溃阶段（1945 年至今）。

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军击败，这标志着英国争夺治海权的开始。此后在与欧洲强国的争霸中，英国建立了北美殖民地，霸占了印度，夺得了圭亚那、西印度群岛、锡兰和好望角，占领了西非海岸诸商站。如果说，在 18 世纪末，法国已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的话，拿破仑在 1815 年的惨败则宣告了英帝国霸权地位的确立。

从 1815 年到 1914 年，英帝国大力扩张，急剧膨胀。这一百年的殖民史意味着三重意义上的扩张。首先是人口扩张。在 1815 年后，失业问题严重，英国鼓励移民的政

* 多伦多大学校友会和历史系提供的资助使我得以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完成资料收集工作，尼日利亚学者 G. Ugo. Nwokeji 向我提供了有关资料和未发表的论文，在此一并致谢。

策被攻击为“铲除乞丐政策”^①。在一百年里，共有 2260 万人离开英国迁徙他处^②。其次是领土扩张。这一过程在 19 世纪最后 20 年急剧加速。到一战前夕，英帝国面积已达 338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150 个英国本土。第三是经济扩张。这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资本输出和金融渗透三个方面。奴隶贸易的废除（1807 年）为合法贸易开辟了道路；高额利润导致资本投向海外各地^③；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将其触角伸向各处。

从 1914 年到 1945 年则是大英帝国逐渐衰落的过程。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殖民统治的根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仰的动摇。欧洲人民已不再相信帝国的神话，而殖民地人民对欧洲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产生了怀疑。第二，经济的衰退。本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和两次大战使英国财力耗尽。二战结束时，英国已从资力雄厚的债权国沦为一个欠债 37 亿英镑的负债国^④。第三，国际新格局的形成，这主要指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美苏在二战后期以及 50 年代对殖民地问题直接过问，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国际地位。第四，民族主义的兴起。殖民地政治组织与政党的出现和亚非民族独立运动使英国面临最严重的挑战。

如果说，两次大战已为大英帝国的崩溃掘好墓地的话，1945 年以后的年代则成为它寿终正寝之时。在短短 20 年里，拥有 50 多个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岛屿殖民地了。在这一阶段，非殖民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1946—1951 年，1956—1965 年。在第一个时期，首先是约旦、叙利亚的自治（1946 年），其次是印巴分治（1947 年），最后是缅甸、锡兰（1948 年）和利比亚（1951 年）的独立。这些可谓是“在 1939 年即已基本具备独立条件”的国家。第二个时期，首先是英国从苏丹撤军（1956 年），其次是马来亚和加纳的独立（1957 年）。到 60 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英属非洲殖民地都已先后独立。一些国际组织的成立也为加速非殖民化创造了条件。联合国为反对殖民主义提供了讲坛，非统组织的成立（1963 年）加速了独立运动的进展，石油输出国组织（1961 年）为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了尝试，而多次亚非会议则为民族独立运动壮大了声势。这些都与英帝国的崩溃互为因果，从而构成了一曲非殖民化的主旋律^⑤。

“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一词最早出现于 1932 年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

① T. O. 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 牛津 1984 年版, 第 142 页。

② A. J. Christopher, *The British Empire at its Zenith*, 伦敦 1988 年版, 第 37 页。B. Thomas,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伦敦 1958 年版, 第 65 页。

③ Christopher, *The British Empire at its Zenith*, 第 68 页。

④ 内阁会议档案 129/48, 财政大臣笔记, 1951 年 12 月 20 日, 附件。

⑤ John Darwin, *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 伦敦 1988 年版; J. Hargreaves, *Decolonization in Africa*, 伦敦 1976 年版; R. F. Holland,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Macmillan 1985 年版; Rudolf von Albertini, *Decolonization*, 纽约 1971 年版。

“帝国主义”词条中，作者毛里兹·波恩指出，除黑非洲以外，几乎在所有的欧洲殖民地都出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在全世界一个反对殖民化的时代已经开始，非殖民化正在迅速展开”。1934年，他在《国际事务》上进一步指出：“殖民化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运动正面临末日，……帝国崩溃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进行”，并认为非殖民化不仅是一场反对政治依附的运动，同时它也反对经济依附^①。很明显，作者在此创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新词汇，它表明欧洲殖民化时代已经终结，民族独立的曙光开始出现。50年代初，法国前殖民官员亨利·拉波瑞的著作使“非殖民化”一词更为普及^②。最初，“非殖民化”主要指亚非人民从殖民统治下争取政治独立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深入，“非殖民化”开始包括所有前殖民地摆脱宗主国政治控制、经济剥削和文化统治等各个方面的斗争。它既可指独立前的反抗，亦可指独立后的斗争。

然而，“非殖民化”一词的流行并不顺畅，它几乎同时遭到两个方面的抵制。一方面，英国官方对“非殖民化”一词讳莫如深，殖民部次官希尔顿·波因顿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中仍极力否认英国政府正式使用“非殖民化”一词。同时，《牛津大辞典》直到1975年未列入该词（1972年补编除外）；而1974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更未将“非殖民化”列入条目^③。另一方面，少数学者亦对此词提出异议，认为“非殖民化”意义含混，既可表示一种中性，即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独立，亦可隐含另一种意义：帝国主义国家突然改变政策而有意让殖民地独立；或认为“非殖民化”暗示着各殖民帝国在二战后的解体是有准备有步骤的，从而主张用“独立”或“自治”等词取代“非殖民化”一词^④。

但绝大多数学者常常使用该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内涵丰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可作为中性词通用；但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已认可“非殖民化”一词的含义。1960年，第

①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7, Macmillan 1932年版，第612页；M. Bonne, *The Age of Counter-colonization Period*, 载 *International Affairs*, 13: 6 (1934), 第845—847页。在俄文文献中，“非殖民（地）化”一词出现更早，最著名的是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会上关于非殖民（地）化问题的争论。参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3页。

② Henri Labouret, *Colonisation, Colonialisme, Decolonisation*, 巴黎1952年版。

③ A. Kirk-Greene, *Decolonisation in British Africa*, 载 *History Today*, 42: 1 (1992), 第45页；J. Hargreaves, *The End of Colonial Rule in West Africa*, 伦敦1976年版。关于牛津大学与英帝国的关系，可参见R.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牛津1991年版；F. Madden, *Oxford and the Idea of Commonwealth*, 伦敦1982年版。

④ J. Suret-Canale, *From Colonization to Independence in French Tropical Africa: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P. Gifford & W. Louis,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 Decolonization 1940—1960*, Yale1982年版，第445—482页。A. Boahen, *Ghana Since Independence*, P. Gifford & W. Louis, *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Independence: The Transfer of Power, 1960—1980*, Yale 1988年版，第199—224页。

15届联大发表了一个宣言（后来被称为“非殖民化宣言”），表达了联合国对殖民地独立问题的关注和期望。1961年第16届联大通过1654号决议案，批准成立一个17人委员会（1962年增至24人，故称为“24人委员会”或“非殖民化委员会”），负责检查和督促“非殖民化宣言”的执行情况。这一决议案注意到“某些国家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部分或整个地破坏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现象”，并要求这些国家忠实执行非殖民化宣言^①。这是“非殖民化”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文件中。1965年，联合国组织专门发表了一个小册子，总结24人委员会的工作，其标题为《联合国与非殖民化》。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非殖民化”一词从其产生到使用，含义中性，涵盖面广，它表明了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这种转型过程。

对英帝国非殖民化这一历史现象的解释，一直没有定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即民族主义论、外来因素论、新殖民主义论和计划撤离论。民族主义者认为非殖民化是殖民地民族主义崛起的结果，而非宗主国的计划使然。英国政府从未甘心自愿放弃殖民地，而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的有效组织和反抗将英帝国主义者赶出了殖民地。西非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马来亚、肯尼亚和塞浦路斯的武装斗争及中非联邦、西印度联邦的持续反抗成为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以非洲为例，对东非和中非殖民地历史的研究、强调民族主义的起源，探讨初期抵抗运动和现代民族主义的联系，并分析精英领导与群众基础的关系^②。在英属西非的研究中，加纳史学家博阿享用黄金海岸争取独立的史实说明：“英国没有作出任何计划。她所做的不过是在每一个阶段对每一个殖民地的压力和变化的形势作出反应。”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英国殖民地在不同时间取得独立的这一历史事实。尼日利亚史学家阿贾伊则通过分析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得出结论，“从尼日利亚看，英国有意识地主动放弃帝国的意图并不明显”^③。

持民族主义论的主要为非洲学者。他们认为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殖民地人民表现了巨大的主动性，而各殖民帝国只是对此作出消极反应。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在非殖民化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这是关键因素，而其他因素（宗主国或外部推动）只是决定了非殖民化的时间、速度和不同方法。非殖民化并不是帝国主义将权力移交给殖民地人民的平稳过程，相反，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往往充满暴力和流血。非

① Assembly Resolution 1654 (XVI).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61 年版, 第 56 页。着重点为本文作者加。

② T. O. Ranger, *Connection between Primary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Modern Mass Nationalism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载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9 (1968), 第 437—453、631—641 页。John Iliff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aji Maji Rebellion*, 载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8 (1967), 第 495—512 页。

③ Boahen, *Ghana Since Independence*; J. Ajayi & A. Ekoko, *Transfer of Power in Nigeria: Its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Gifford & Louis, *Decolonization*, 第 199—224、245—270 页。

殖民化是殖民地人民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才取得的成果。

第二种观点为外部因素论或国际条件论。安东尼·罗认为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和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亚洲的独立运动使欧洲帝国在非洲的统治松动，同时为非洲的非殖民化提供了先例和条件^①。也有学者突出联合国对战后非殖民化的贡献，但更多的是强调美、苏，特别是美国的作用。路易斯的研究即是一例。他通过对二战后期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思潮和扩张主义的态度，美国对英属殖民地问题的看法以及英国的反应等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美国的反殖民主义态度给予欧洲殖民帝国的非殖民化以强有力的推动”^②。

外来因素论强调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和两个超级大国崛起这两个事实，力图证明英国（或欧洲）的非殖民化是外部条件使然。不过，近年来这些结论已日益受到修正。如安东尼·罗后来认为在非洲的权力移交过程中，非洲人的不满反抗和当地精英分子的领导努力都是重要因素^③。而路易斯也明显修正了他的立场。1985年他在《国际事务》上撰文，通过对美国三任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处理三个地区（印度、利比亚、苏伊士运河）非殖民化的个案分析，得出结论：“美国对英帝国解体的影响很难估量，但肯定是很小的”^④。

第三种解释是新殖民主义论或依附论，这主要是新马克思主义派对非殖民化的解释。新殖民主义论一般认为，非殖民化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本土资产阶级的存在。在几百年的殖民经济活动中，一个本土的买办阶级（阶层）逐渐形成。这个集团的力量不断扩大，从而使殖民主义者可以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将政权交给这个集团。第二，原始积累的形成让位于资本主义积累。在后一过程中，市场对劳动力的自然调节已足以保证剩余价值为资本家阶级占有，对殖民地的直接控制已不十分重要，为了避免政权落入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手中，殖民主义者将权力移交给温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同时，新殖民主义论认为，独立国家建立自主的工业化在多方面受到阻碍：国内市场相对狭小；新工业主要为外资建立并拥有，其出口型和外向型特点对本地工业帮助不大；外资企业集中在资本密集的行业，对地方产品的生产刺激不大，而剩余价值则源源不断流向国外。换言之，国际资本对出口贸易的垄断权由于他们对国际市场技术的垄断而得以保持。这样，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完成了政权的移

① D. A. Low, *The Asian Mirror to Tropical Africa's Independence*, Gifford & Louis,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 第1—30页。

② W. 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1941—1945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牛津1977年版，第3页。

③ Low, *The End of British Empire in Africa*, Gifford & Louis, *Decolonization*, 第33—72页。

④ Louis, *American Anti-coloni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ritish Rule*, 载 *International Affairs*, 61: 3 (1985), 第395—420页。

交，同时又保住了自身利益，而独立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和依附的地位。概言之，非殖民化的结果是新殖民主义的建立^①。

然而，新殖民主义论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第一，这种观点虽然在政治宣传上颇有效果，但却存在资料不足和简单化的倾向。它不但暗示殖民地在独立后没有什么变化（显然与事实不符），同时亦成为某些独立国家经济不成功的推诿之词。第二，这种观点实际上承认欧洲帝国主义对非殖民化是精心策划、有长期准备的，其政策非常成功。这也与史实相违（后文将论及）。第三，这种理论既否定了前殖民国家文化传统的创造性，同时亦为独立国家的发展前景披上了一层决定论的悲观色彩。这种理论已引起了一些新殖民主义者的自我批判^②。

第四种是英国计划论或主动撤离论。其主要论点是：英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是持续的、有序的，从杜尔海姆报告（1839年）后就开始有计划逐步实行；英帝国的统治对殖民地而言利大于弊，是发展和进步的体现^③；所有殖民政策都与传播欧洲文明、提高教育程度、加强经济建设与加快宪制改革有关，而这一切都是为非殖民化作准备。一旦非殖民化完成，英帝国的目的即告完成。虽然持这种观点者的主要论点一致，但对非殖民化的原因则有多种具体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非殖民化是英国民主制度的一种体现，这不是撤退，而是英帝国使命的完成。根据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的说法，英帝国的解体不是软弱和衰落的表现。英国人并未失去统治的意志和力量，他们的责任只是将文明传播给其他民族^④。有的则认为非殖民化是对英帝国经济衰退的一种积极反应，因而在50年代经济回升后马上组织撤离，这是承认现实、急流勇退的表现^⑤。更有一些原殖民地官员认为英国从殖民地退出是出于对殖民地的关心，整个过程是经过慎重考虑和严密计划的，是对新形势的富

^① Colin Leys, *Underdevelopment in Keny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colonialism*, 伦敦1975年版，第1—27、207—253页；P. Gutkind & T. Wallerste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Africa*, 伦敦1976年版；S. Amin, *Neo-colonialism in West Africa*, Harmondsworth, 1973年版。

^② Colin Leys, *Accumulation, Class Formation and Dependency: Kenya, M. Fransman, Industry and Accumulation in Africa*, 伦敦1982年版，第170—192页。关于依附论，可参见李安山《依附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

^③ L. Gann & P. Duignan, *Burden of Empire*, 斯坦福1967年版，第360—382页。

^④ H. Macmillan, *Pointing the Way*, 伦敦1972年版，第116—117页；J. M. Lee,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Good Government: A Study of the Ideas Expressed by the British Official Classes in Planning Decolonization 1939—1964*, 牛津1967年版。

^⑤ 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Macmillan1982年版，第404—407页；Black Africa 1945—1980, 伦敦1986年版，第1—54页。

有远见的策划^①。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非殖民化是始于二战之中或二战以后的一种积极策划，起因虽有不同，但这是长远规划，而非应急措施^②。计划论不仅为英帝国非殖民化提供了体面的解释，同时因为它师承殖民史学之遗脉，所以在西方史学界颇为流行，影响面极广。

二

综上所述，种种争论的焦点是：非殖民化是否有计划，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论和主动撤离论正面交锋的一个实质性问题。下面对此作进一步分析。计划撤离论虽然观点各异，但在史学界最有影响的是两个时间表，即弗林特的 1938—1943 年论和罗宾逊的 1945—1947 年论。

1983 年，弗林特在《非洲事务》上撰文，他不仅对新殖民主义论进行了批判，同时作为历史学家首次提出了“有计划的非殖民化”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二战爆发前后的几个月里，英国殖民部的殖民地政策发生了一场革命。麦克唐纳于 1938 年出任殖民大臣，开始策划殖民政策的改革。他于 1938 年 6 月 27 日在牛津大学有关殖民管理的夏季学校的讲话和 1939 年在大英帝国协会的讲话标志着这一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经济上的“非自由化”和政治上的“非部族化”。在经济上，自由放任的政策让位于“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伦敦开始考虑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在政治上，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开始取代酋长成为权力移交的对象；海利勋爵被派往非洲调查土著政策问题，其调查报告为威廉斯改革计划提供了根本依据，并成为 1940 年至 1948 年“殖民改革运动的有机蓝图”^③。

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澄清。第一，麦克唐纳的观点是否可代表英国政府的政策？第二，海利勋爵报告的实质是什么？第三，殖民部是否从 1938 年起就制定了一套非殖民化计划？从结构上看，英国殖民政策的制定并非靠殖民大臣一人，而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决定：内阁与议会、殖民部及地方总督。同时，在英国内阁会议中，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是几个最主要的部门，殖民部的地位并不高。殖民大臣对下议院负责，除

① A. Burns, *In Defence of Colonies*, 伦敦 1957 年版；J. Fletcher-Cooke, *The Failure of the Westminster Model' in Africa*, 载 *African Affairs*, 63 (1964), 第 197—208 页。

② John Flint, *Planned Decolonization and Its Failure in British Africa*, 载 *African Affairs*, 82 (1983) 第 389—411 页；R. Robinson, *Andrew Cohen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Tropical Africa*, 1940—1951, Morris-Jones & G. Fisher, *Decolonisation and After*, 伦敦 1980 年版, 第 50—72 页；R. Pearce, *The Colonial Office and Planned Decolonization in Africa*, 载 *African Affairs*, 83 (1984), 第 77—93 页。

③ Flint, *Planned Decolonization*, 第 389—411 页。

个别外，往往由资格较低、资历较浅的人担任，而麦克唐纳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①。再者，麦克唐纳的两次讲话可以说是他对殖民政策的思考，但很难界定为殖民政策。他关于殖民地改革的观点带有很大的功利性：为英帝国争取殖民地对战争的支持。他在大英帝国协会上的讲话就提得很明确，对于殖民地，“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忠诚予以回报，将我们掌握的最好礼物——自治和自由——给予他们”^②。这一点他在向首相陈述自己观点时也毫不掩饰^③。有的学者认为，麦克唐纳并不是一个执著的人，非常容易受他人影响，他的种种表白只是对殖民地未来前景是自治领地位的暗示，仅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④。这种见解并非没有道理。

第二个问题是海利及其报告的作用。报告在《非洲概览》的发表（1938年）确立了海利作为非洲殖民政策顾问的权威地位，他曾任殖民地战后重建委员会主席和殖民研究委员会主席。弗林特认为，1938年到1945年间他在制定殖民政策方面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力”。海利认为经济和社会条件必须先行发展，从而为政治改革提供基础。这一观点不失为远见，但在实际运作中并未采纳。他力求争取非洲人的支持，以“避免与英国接触中的偏见”；认为无论进行何种改革，殖民政府必须牢牢控制权力；为便于统治，他主张政府以强迫形式将一些小行政区合并^⑤。同时，他既反对殖民地立法议会中非官方成员占多数，亦不同意由非洲人担任殖民政府的部长职务。1943年，当黄金海岸总督伯恩斯违背他的意愿实行非官方议员多数改革时，他在上议院大动肝火，发表长篇讲话，认为时机根本未成熟^⑥。在殖民政府应依靠谁这一问题上，他的主张也是极现实的。如他在第一次访问黄金海岸时曾对间接统治的方法深表怀疑；但当他受麦克唐纳委派再度去黄金海岸时，则强调殖民政府必须继续“通过土著权力进行管理的制度”^⑦。很明显，海利强调的是殖民地改革，其出发点是维护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利益。虽然在他的报告中出现过“自治”一词，但根据上下文来看完全等同于地方自治，这

^① A. N. Porter & A. J. Stockwell,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nd Decolonization, 1938—1964*, Vol. 1, Macmillan 1989 年版, 第 9 页。关于殖民部的地位, C. Jeffries, *The Colonial Office*, 伦敦 1956 年版; J. M. Lee & M. Petter, *The Colonial Office, War and Development Policy*, 伦敦 1982 年版, 第 14 页。

^② 殖民部档案 847/20/47139。麦克唐纳于帝国日在大英帝国协会上的讲话, 1939 年 5 月。

^③ 殖民部档案 847/13/47100。威廉斯备忘录, 1939 年 3 月 7 日。

^④ Pearce, *The Colonial Office*, 第 79 页; R. Pearce, *Turning Point in Africa: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938—1948*, 伦敦 1982 年版, 第 23 页。

^⑤ Lord Hailey, *Native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Kraus 1979 年版, 第 50、54—62、128 页。

^⑥ John Cell, *Hailey: A Study in British Imperialism 1872—1969*, 剑桥 1992 年版, 第 279—280 页。

^⑦ 殖民部档案 96/767/31228/1, 总督哈德逊致道伟, 1940 年 5 月 31 日, 附件“与海利勋爵的讨论”。

与民族独立的意思相距甚远。

那么，在这一期间殖民部是否制定了一套非殖民化计划呢？从目前解密的档案看，回答是否定的。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声明。其中第三条规定了所有民族具有选择各自政府、恢复被剥夺的主权以及自治的权利。此处的“所有民族”，按丘吉尔的原意是指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各国，而罗斯福指的则是世界上所有民族^①。这一条理所当然地在英国议会引起激烈辩论。9月9日，丘吉尔在下议院作出解释：这一条与英国殖民地无关。他宣称，在英属殖民地自治制度逐步演进的问题上，“我们发表过种种公告。这些公告自身完整、意思明确，与受到关联的各领地和人民的条件和状况相联系。这些公告与激发联合声明的自由正义的崇高概念完全一致”^②。事实并非果真如此。丘吉尔对英帝国的信仰到了宗教崇拜的地步，加拿大总理曾说，“英帝国和英联邦对于他来说就是宗教”^③。1942年11月，丘吉尔公开声明，英国必须保持自己的殖民地，“我成为英王的第一部长并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破产拍卖”^④。直到1953年，他仍坚持一种帝国主义立场。为了解决殖民地危机，他在给艾登的信中建议：“你在埃及、苏伊士运河、苏丹、南部苏丹以及以后中东的麻烦，出路在于动作而非言语，行动而非条约……找点理由派皇家空军将两个营的步兵和三四个装甲连送到喀土穆，总督可以宣布这是保护公共秩序的需要”^⑤。

如果说丘吉尔当时在下议院的解释是文过饰非的话，前首相麦克米伦在1967年的表白则完全是自吹自擂。麦克米伦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大西洋宪章时，曾指责罗斯福过于热衷于概括，而“英国的传统则更为实际，我们当时一直在考虑根据不同领地的历史和背景使它们朝自治方面积极发展的步骤”^⑥。而在1942年，当殖民部试图整理一份白皮书以详细解释丘吉尔的上述表白时，当时任殖民部政务次官的麦克米伦发现：“我不认为首相在1941年9月9日作此声明时认识到这个领域的真正空白——他提的那些公告既不完全，亦模棱两可，同时是不连贯的、含糊空洞的。”他认为，“我们决不能发表这份白皮书，那确实是最危险最愚蠢的，……在私人生活中，这无疑将导致破产”^⑦。

看来，当时的英国殖民政策并非如丘吉尔所说的与“自由正义的崇高概念完全一致”，亦非如麦克米伦所描述的“一直在考虑”殖民地的自治问题，而是殖民大臣格兰

^① 原稿见丘吉尔自传：*The Grand Alliance*，波士顿1950年版，第433—437页。

^② 《议会辩论（下议院）》第374卷，丘吉尔的发言，1941年9月9日，第67—69列。

^③ J. W. Pickersgill, *The Mackenzie King Record*, Vol. 1, Toronto 1960年版，第679页。

^④ 1942年11月11日《泰晤士报》。

^⑤ 首相办公室档案11/700，丘吉尔致艾登，《重新布署行动》，1953年12月11日。

^⑥ H. Macmillan, *The Blast of War*, 伦敦1967年版，第178页。

^⑦ 殖民部档案323/1848/7322，麦克米伦笔记，1942年9月1日。

波恩勋爵承认的“意义极端含混”^①。实际上，在1943年，英国上层官员对殖民问题的态度都相当僵硬。内务大臣毛里森在反驳美国人的批评时说，给予殖民地完全自治是“无知的、危险的谬论”，“这无异于如同把前门钥匙、银行帐号和滑膛枪给10岁的孩子”^②。殖民大臣的意见也是如此，“毫无疑问，甚至我们的殖民地亦将会成为成人民族，这一天可能到来。但现在他们还是孩子，因而必须像小孩一样对待”^③。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国政府在1938—1940年间从未考虑过殖民地的独立问题，弗林特“有计划的非殖民化”的论点是很难成立的。

与弗林特不同，罗宾逊认为英国非殖民化计划的标志是1945年工党执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他的主要论点是：早在1945年，伦敦的战略家们即预料到殖民地的独立不可避免，并开始制定计划；1947年一个加速殖民地自治的计划已经确定；作为计划中的第一步，殖民政府的民主化并非出于对民族主义的恐惧；相反，这种民主化促使非洲的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民众运动；而这一全盘计划应归功于殖民部负责非洲事务的安德鲁·科恩^④。对于罗宾逊的论点，也有必要提出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从1945年开始，英国殖民部是否开始制定非殖民化计划？第二，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作用如何？

早在二战结束前，英国就为保住其殖民地不遗余力。在圣弗兰西斯科的联合国会议（1945年）前后，丘吉尔为此绞尽脑汁。他认为，在会议上，法国、荷兰等殖民国家肯定会极力反对国际托管制度。他对英国代表团的建议是：让这些国家去打头阵，而英国则应支持他们的立场。他反复强调，在托管地问题上，决不允许任何妥协^⑤。英国对香港的处理即是一例。二战结束前，丘吉尔曾为重获香港而与赫尔利唇枪舌战，英国并计划在香港外围地区训练游击队，从而为日本人失败后接管香港作准备，这一计划被美国人称为“险恶的目的”而予以拒绝。在香港问题的谈判中，由于英国人的强硬态度，蒋介石最后只好让步^⑥。

虽然英国工党在竞选时十分注意殖民地问题，但1945年上台后，国内问题对其更为重要。正如古普塔指出的：“是英国选民使工党赢得了多数票；对于他们来说，建立

^① 殖民部档案323/1848，格兰波恩备忘录，1942年9月4日。

^② 1943年1月11日《曼彻斯特卫报》。

^③ 殖民部档案323/1858/9057B，殖民大臣致副首相，1943年1月14日。着重点为本文作者加。

^④ Robinson, Andrew Cohen, 第50—72页。

^⑤ 内阁会议档案65/60 W. M. (45)第42条结论；第61条结论。

^⑥ 外交部档案371/F234, 1415, 1417；外交部档案371/F1954/88/10。可参见C.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伦敦1978年版第546—585页。外交部档案371/46212/F5762/186/19，西摩致外交部，1945年8月26日。可参见J. Sbrega,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olonialism in East Asia 1944—1945*, 纽约1983年版第74—77页。

一个福利国家比殖民地改革更为重要”^①。尽管工党政府进行了一些殖民地改革，特别是在殖民大臣琼斯领导下由科恩主持的非洲殖民地改革（后文将详细论及），但有两点必须说明：第一，改革并非罗宾逊所描述的那样理想化：“通向独立的大门已经向非洲民族主义者开锁；一旦他们有能力即可推开。”这一改革是十分有限的。殖民部官员佩特勒在看了科恩的备忘录后评价：“非洲现在是我们殖民地位的核心：一个唯一我们可望从中取得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大陆。我们在那里的地位从根本上靠我们与非洲人整个地站在一起，而这取决于我们在非洲的地方政府方面是否取得成功”^②。此项计划是建立在殖民地改革而不是非殖民化的基础上，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所谓“自治”来安抚殖民地日益不满的情绪，以维护英帝国的长远利益。

其次，由于仅是殖民地改革计划，因而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格格不入，与后来局势的发展亦极不连贯，互相矛盾。1948年底，库西将恩克鲁玛排除在黄金海岸宪制改革委员会以外；1950年恩克鲁玛被抓进监狱，第二年却当选为政务部长，1952年被任命为总理。在50年代初，坦噶尼喀总督特怀林将尼雷尔描述为“捣乱者”，并告诫部下尽量避免与他打交道；而在1957年，殖民政府不得不承认尼雷尔为独立国家的领袖。1946年，民日利亚总督理查兹将阿齐克韦称为“一个不负责任的精神病患者”，但在1947年，阿齐克韦被选进立法议会并于独立时成为国家元首。其他英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袖如肯雅塔、班达等都在独立前被拘捕囚禁过，而在独立时则成为国家元首。从整个英帝国解体的过程看也说明了英国殖民政策与现实的不协调。印巴的分治，缅甸、锡兰的独立，西印度联邦、马来亚联邦和中非联邦的破产，英国从中东的撤军，苏伊士运河的惨败以及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加速，这些事件也都超出了英国政府的精心盘算。

第二个问题是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崛起和作用。罗宾逊认为：科恩计划“并不是由于害怕民族主义而产生的；相反，这一改革方案使西非沉睡的民族主义得以觉醒”，因而科恩“在分解英国殖民统治和热带非洲的民族主义崛起方面比大部分非洲政治家做得更多”^③。这种观点是与基本史实相违背的。举例说，英属非洲的工会组织在二战中即已成立并展开活动，如较早成立民族劳工组织的有冈比亚（1938年），塞拉利昂（1943年），尼日利亚（1943年），加纳（1945），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1946年）等。一些地域性或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政党在二战前即已成立，如黄金海岸土著权利保护协会（1897年），英属西非国民大会（1920年），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1923年）等。尼日

① P. Gupta, *Imperialism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914--1964*, Macmillan 1975年版，第283页。

② 殖民部档案847/35/47234/1(47)，佩特勒笔记，1946年11月1日。

③ Robinson, Andrew Cohen, 第59页。

利亚青年运动在1938年即有10000名成员。在苏丹、尼萨兰（今马拉维）等地，地方群众组织早在一战前后即已出现，甚至提出过“自治”的口号；而这些组织或政党在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已直接或间接地担负着领导作用。1945年以前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存在已不成为问题，这是西方学者也公认的^①。

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运动是否对殖民政策的制定有影响。早在1942年1月，黄金海岸的总督伯恩斯即认识到：反对英国的愤怒浪潮和种种骚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殖民政策的让步往往太迟而不起作用了”。他为此不顾海利勋爵的反对而任命两名非洲人进入行政议会。他的看法得到了尼日利亚总督的认同^②。负责东非事务的殖民部助理次官道伟在1942年也谈到英国殖民地的危机，认为殖民地人民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是很难用一点点卫生或教育条件的改善来取代的。英国面临的问题是找到一种方法使这些殖民地“继续站在大不列颠一边”，否则，“大英帝国将在20世纪失去另一个大陆”^③。1945年，为要求增加生活补贴，尼日利亚17个工会举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大罢工。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党的主席麦克莱宣称：“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解放已指日可待”^④。这次罢工给殖民政府和伦敦以很大震动。1946年，在民族主义政党组织下，尼日利亚掀起了一场反对殖民政府的宪政改革运动。科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虽然非洲农村人口对自治没有什么要求，“但在西非，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和相当多受其影响的人通过新闻媒介要求以更快的速度走向自治，这一要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明显”。他的这段话正是出现在他草拟的“非洲的宪制发展”的文件中^⑤。由此可见，殖民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

三

不容置疑，在1938—1943年与1945—1947年两个时期殖民部均制定了改革计划。

^① T. Hodgkin,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伦敦1956年版; J. S. Coleman, *Nigeria: Background to Nationalism*, L. A., 1963年版; D. Kimble,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 The Rise of Gold Coast Nationalism 1850—1928*, 伦敦1963年版; R. Rotberg,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Central Africa*, Harvard1965年版。

^② 殖民部档案554/131/33701/42,《伯恩斯致格兰波恩》(机密),1942年6月30日。可参见伯恩斯自传, *Colonial Civil Servant*, 伦敦1949年版,第194—195页。

^③ 殖民部档案967/57/46709,道伟备忘录,1942年7月。

^④ 转引自W. Oyemakinde, *The Nigeria General Strike of 1945*,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2 : 4 (1975) 第698页。R. D. Pearce, *Governor, Nationalists and Constitution in Nigeria, 1935—1951*, 载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9 : 3 (1981), 第289—307页。

^⑤ 殖民部档案847/36/47238,附件3《非洲的宪制发展》。他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也强调了这一点。Andrew Cohen, *British Policy in Changing Africa*, 伦敦1959年版,第34—36页。

但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计划？这些计划的实质是什么？它们对殖民地前途的影响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分析当时的形势和殖民官员的态度外，还必须分析各项计划本身。

1943年，殖民部官员欧文·威廉斯根据海利在调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起草了一份殖民地改革备忘录，主张西非的宪制发展需经五个阶段。在前三个阶段中，改革主要集中在市议会和地区议会；在农村建立土著政权的地区议会，但纯粹是顾问性质；逐步引进自由选举的方法，用年轻受过教育的成员取代“专制政权”；在立法议会中，逐步增加任命的非洲议员。在第四阶段中，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使立法议会中非官方的非洲议员占多数。第五阶段为“走向自治阶段”^①。

尽管这份备忘录可以看作是一个计划，但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对立法议会改革持保留态度。备忘录强调，在前三个阶段，“这种发展的目的不是用非洲人的多数”来取代现有立法形式；而在第四阶段，威廉斯认为其他地区的经验表明非官方多数不是一种自治形式的教育，而往往成为对“不负责任的多数”的一种训练，因而怀疑这个阶段是否必要。第二，强调保留总督的权力。备忘录对行政议会的改革根本未提及，同时认为总督必须保留最高权力，以便于在任何情况下控制局势，防止非官方多数捣乱。第三，对自治问题略而不提。虽然第五阶段为“走向自治阶段”，但没有列入任何具体内容。备忘录甚至认为“试图预测西非的自治将采取什么方式或需要何种方法是很不明智的”。第四，缺乏时间安排。整个计划没有一处提及具体的日程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威廉斯计划是权宜性的，对“自治”这一关键问题缺乏认识和诚意。同时，由于对前三个阶段估计的时间过长（“很多年，或许很多代人”），此计划对殖民政策的实际操作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在1944年，为抵制美国对英国殖民地问题的批判，殖民部委托两位殖民官员制定了一个称为波因顿—罗宾逊的殖民地方案。虽然这是为处理战后殖民地问题的国际谈判准备的，但也充分反映了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僵硬态度^②。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弗林特提出的“有计划的非殖民化”这一观点提出疑问，因为有计划的殖民地改革和有计划的非殖民化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弗林特当然注意到这一漏洞。他一方面承认在非殖民化出现以前，没有任何英国人有意识地在非洲进行非殖民化；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去追究非殖民化政策何时最后确定“是一个与历史无关的问题”，不应为此浪费笔墨^③。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他的文章标题为“有计划的非殖民化”，其观点是从1938年起殖民部即开始计划非殖民化，这本身又是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人们就不能提出“非殖民化政策何时最后确定”这

① 殖民部档案554/132/33727，威廉斯备忘录，附件《西非的宪制发展》。

②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第378—408页。

③ Flint, *Planned Decolonization*, 第394页, no. 8.

样一个问题呢？十分明显，海利的种种建议（以及威廉斯计划）不过是为加强殖民统治出谋划策，仅此而已。如果将此冠以“有计划的非殖民化”，恐怕海利勋爵自己也难以同意。他曾在调查报告中明确表示：在对非洲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试图为这些人民的政治前途作出计划，我们这种做法是否正当很值得怀疑”^①。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被罗宾逊称为“革命宣言”的科恩计划。1947年2月，殖民大臣格里奇·琼斯向各地总督发出了关于非洲殖民政策改革的电文，主张殖民统治不能固守“间接统治”的教条而应进行改革，并强调殖民政府必须做到“有效率、民主化和本地化”^②。同时，科恩的改革计划业已制定。这个计划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非直接选举的非洲人将在立法议会上占多数，其中一至二名非洲人可选入行政议会；与此同时地方各级的选举可积累经验，以推进民主化进程；并注意将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纳入各级文官位置。第二阶段，非洲的立法议会议员以政府各内务部门首脑的资格向总督负责。科恩认为一旦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相对延长，自治的基础就会更为坚实。第三阶段，立法议会的非洲成员应开始掌管除财政、安全或外务以外的政府各部。第四阶段，代表多数党的非洲各部长将组成内阁议会，集体负责立法，以建立一个威士敏斯特模式的政府^③。

科恩计划从内容上看确实比威廉斯计划进了一步。但这个计划也存在着缺陷。第一，科恩计划在假设等殖民地人民作好了一切准备，政治上成熟后，由英国将自治地位恩赐给殖民地。然而，历史表明，殖民地的自治地位从来不是殖民者恩赐的，而是经过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被称为“宣传家”、“煽动者”的努力而赢得的。美国的独立如此，英联邦几个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经历亦是如此。第二，殖民地的改革计划虽然由民族主义运动所推动，但计划对民族主义领袖的未来作用缺乏明确认识。这样的政治近视必然导致政策失误，这已为殖民地的形势发展所证实。第三，通篇计划未提及“非殖民化”和“独立”的字眼，而着重于“自治”。很明显，此计划仍在于维护殖民帝国的权力，充其量是让殖民地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

那么，对科恩计划的后果应作如何评价呢？不容否认，琼斯和科恩的一系列改革为二战后的殖民地带来了一线生机，难怪佩特勒认为科恩提出的改革计划是“近年来发生在殖民地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④。然而，整个计划因种种因素而搁浅了。除了1948年初的阿克拉骚动打乱了伦敦的精心盘算这一因素外，另一重要原因恐

① Lord Hailey, *Native Administration*, 第54页。

② 殖民部档案847/35/47234/1(47), 第41号通告。

③ 殖民部档案847/36/47238/1(47), 1947年2月6日会议记录。详细计划可参见Robinson, Andrew Cohen, 第50--72页; Robinson, Sir Andrew Cohen: *Proconsul of African Nationalism 1909—1968*, Gann & Duignan, *African Proconsuls*, 纽约1978年版, 第353--364页。

④ 殖民部档案847/35/47234/1(47), 佩特勒笔记, 1946年11月1日。

怕是殖民地总督的不合作态度。在 1947 年 11 月伦敦举行的总督会议上，肯尼亚总督米切尔认为“殖民部已走火入魔，陷入乌托邦梦想”，并认为琼斯的讲话是胡说八道^①。而尼日利亚总督米尔威顿则称科恩是“白厅的智力梦想家”^②。科恩计划无疾而终^③。

现在再来看看殖民地经济改革计划。“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是弗林特的另一重要论据。他认为 1940 年殖民部提出而由议会通过的这一法案是“有计划的非殖民化”的重要标志。这个法案源于 1929 年通过的“殖民地发展基金”。当时，英国决定每年提供 100 万英镑“援助和发展殖民地的农业和工业同时促进联合王国的工业和商业”。但这一基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缓解英国本土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有些议员担心作为长期投资，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殖民部次官朗在解释法案时保证：“这个计划虽然主要着眼于帝国发展的长远规划，但无疑将意味着国内一些工业的繁荣”^④。麦克唐纳 1940 年也承认，1929 年法案的根本目的“不是帮助殖民地的发展”，而是“作为解决我们自己的失业问题的计划之一部分”^⑤。实际上，这笔基金主要用于在英国定做制成品^⑥。

1940 年，经麦克唐纳提议，“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在议会通过，决定以每年 500 万英镑用于殖民地今后十年的发展，同时每年将 50 万用于殖民地问题研究。但这项计划似乎因为战争而进展不大。直到 1943 年，殖民官员凯恩在他长达 21 点看法的备忘录中埋怨殖民部对此计划的观望态度；主张殖民部不应坐等地方殖民政府的建议，而应主动地制定计划，对各地殖民政府进行指导^⑦。此法案将福利问题列入殖民地发展计划，这无疑是殖民政策的改革，但将其看作“非殖民化”措施，显然言过其实。第一；麦克唐纳在向议院介绍这一法案时表示，愈是在战争中愈要批准此法案以稳定人心，因为“战争结束后，英国仍将在殖民地政府行使巨大的责任”^⑧。第二，在 30 年代后期，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发生严重骚动，1935 年到 1937 年间，有 39 人在骚动中死亡，175 人受伤^⑨。这主要是因为西印度群岛经济衰退大量失业造成的。解决西印度群岛的

① 菲利普·米切尔日记，1947 年 11 月 10 日，引自 Porter,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nd Decolonization*, Vol. 1, Document 43, 第 277 页。

② Robinson, Andrew Cohen, 第 91 页。

③ J. Cell, *On the Eve of Decolonization: the Colonial Office's Plans for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 1947*, 载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8: 3 (1980), 第 235—257 页。

④ 《议会辩论（下议院）》第 230 卷，波西和朗的发言，1929 年 7 月 17 日，第 482—483 列；第 475 列。

⑤ 《议会辩论（下议院）》第 361 卷，麦克米伦的发言，1940 年 5 月 21 日，第 45 列。

⑥ Jeffries, *The Colonial Office*, 第 43、150 页。

⑦ 殖民部档案 852/588/2，凯恩备忘录，1943 年 8 月 22 日。

⑧ 《议会辩论（下议院）》第 361 卷，麦克米伦的发言，1940 年 5 月 21 日，第 41—42 列。

⑨ W. McIntyr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Minnesota 1977 年版，第 315 页。

经济困境也是此法案通过的原因之一^①。第三，这一计划也是为了笼络各殖民地，使其在战争中继续支持英国，提供人力物力资源。

1945年，“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得以延续，金额增加到每年1200万英镑，殖民大臣斯坦利在向议院解释这一计划时，虽也提到对殖民地的责任，但更多的时间是用在说明殖民地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优势^②。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即可发现，英国战后对殖民地发展计划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经济困境使然。战后的英国不仅从美国进口各种机械，就是粮食和一些基本生活用品也只能从美元区（中美、南美等国）进口，这对负债累累的英国是极沉重的包袱。为此，英国将目光转到了殖民地。如1946年8月，英国派官员到西非了解生产可供出口的植物油的可能性；1946年11月开始在东非殖民地种植花生，虽然此计划遭到抵制，但在食品部的坚持下，到1949年仍在扩大种植面积^③。这样，伦敦千方百计地鼓励殖民地生产各种出口商品以换取美元，同时帮助支付英镑区必须进口的商品。实际上，西非和马来亚的出口大大补偿了英镑区的美元赤字^④。难怪财政大臣克里普直言不讳地宣称：“热带非洲在提供粮食和原料及赚取美元方面为英镑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他承认，整个英镑区形势十分严峻，“依我看，它的生存能力依靠迅速而全面地开发非洲资源”^⑤。殖民大臣亦承认，“马来亚是殖民帝国最重要的美元来源，对马来亚出口的严重干涉将使英镑区美元的收付平衡急剧恶化”^⑥。最重要的是，殖民地在进出口和原料生产上为英国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如殖民地生产的农产品（如可可、花生、棕榈油、西索麻等）的销售直接为官方的市场委员会控制，其价格往往低于世界市场价格。以西索麻为例，坦噶尼喀农民得到的价钱只等于相邻的莫桑比克市场价的一半。西非的情况亦如此^⑦。1947年，殖民地发展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殖民地的工业和商业的投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战后英国仍力图控制殖民地以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剥削。

除了威廉斯计划、科恩计划和“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等比较重要的通盘计划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单项目计划，殖民官员杰弗里斯1947年关于在英国留学的非洲学生的备忘录即是其中的一项。杰弗里斯充分认识到这批学生在未来政治中的潜力，认为他们将成为非洲的“统治阶级”，主张从社会、教育和政治三方面对他们施加影响。

① 《议会辩论（下议院）》第361卷，卢卡斯的发言，1940年5月21日，第51—52列。

② 《议会辩论（下议院）》第407卷，斯坦利的发言，1945年2月7日，第2104—2105列。

③ 内阁会议档案128/16，内阁会议决定，1949年11月14日。

④ P. Bell, *The Sterling Area in the Postwar World*, 牛津1956年版，第56—59页。

⑤ 殖民部档案852/989/3，财政大臣克里普在1947年11月2日非洲总督会议上的讲话。

⑥ 内阁会议档案129/25, C. P. (48) 171, 殖民大臣备忘录, 1948年7月1日。

⑦ D. A. Low, A. Smith,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3, 牛津1976年版, 第300页。A. G. Hopkin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伦敦1973年版, 第268页。

其建议可谓细致入微，从组织非洲学生参观访问学习英国地方政府的运作到发行留英非洲学生名册，从邀请他们到有教养的英国人家做客到组织殖民总督与留学生进行非正式交流。他强调这些活动应尽量保持低调和非官方性质^①。这也是英国企图长期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的一种手段。

二战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1948年初的阿克拉骚乱使英国政府认识到非洲特别是西非局势的严重性，从而对其殖民地保安计划进行修正。为了加强政治控制，1948年伦敦派出一名联络官对西非进行保安视察。他的报告认为西非总的形势“有利于政治阴谋……特别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②。为了对付随时可能爆发的骚乱，殖民大臣迅速将一名警察顾问派往西非，负责向殖民政府提供建议，以促进警察治安的效率，同时负责收集并向伦敦报告各种有关殖民地的情报。在阿克拉事件后亦同时加强了黄金海岸警察和情报系统的运作，以便于控制^③。

所有上述计划均表明：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这种政策到50年代中期仍无改变。1954年，由内阁大臣负责并有殖民部次官参与的“英联邦成员资格委员会”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将英属殖民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及中非、马来亚和西印度群岛等三个联邦。报告认为这些地区将在未来10到20年内独立。第三类为政治发展不确定即前途不明朗的，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塞拉利昂4个殖民地。第二类为小领地，包括塞浦路斯、索马里、香港等21个地区，报告宣称这些是“永远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独立的”^④。然而，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之快是伦敦的战略家所始料不及的。在短短十来年里，上述30个地区即有20个相继独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殖民地改革计划决不可等同于非殖民化计划，前者之目的在于改善和加强对殖民地的政治控制，以竭力维持其殖民统治，而后者应理解为主动撤离殖民地的有关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开始崩溃，从其迅速解体的过程看，至少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前，英帝国没有制定过系统的非殖民化计划。

① 殖民部档案537/2573，杰弗里斯备忘录，《在英国的非洲学生的政治意义》，1947年12月8日。

② 殖民部档案537/2677/14355/6，政治情报总结。1948年11月10日。

③ 殖民部档案537/5183/30173/1，《警察顾问在尼日利亚访问的报告》，1949年4月29日；R. Rathbone,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Ghana in the Late 1940s and 1950s*, 载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1: 3 (1993), 第107—128页。

④ 内阁会议档案134/786，《英联邦成员国的未来》(机密)，官方委员会报告，1954年1月21日。

第二，英国的殖民地改革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每一个时期，根据不同形势，殖民部提出有针对性的计划，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这些计划有的是为了消除殖民地的不满情绪，有的则着眼于统治方式的调整，还有的是为了借助殖民地以解决英国本土的问题。所有这些计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持对殖民地的统治。

第三，虽然这些计划是经过周密策划的，但却不是协调一致、上下连贯的。英国本土和殖民地的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英国议会和内阁、殖民部与地方总督的种种分歧，对“间接统治”的不同理解，以及依靠传统酋长权力抑或知识分子集团的持续争论，这些因素导致有的计划得以实施，有的未完全实施，有的则无疾而终。

第四，这些计划在起因上是消极的、被动的，多为民族主义或国际因素所推动；但在考虑退路上是积极的、主动的。在对殖民地的取舍问题上先是蓄意顶住，50年代后期则以退为进，充分考虑撤出后如何保持关系，这从大部分殖民地独立后仍保持英联邦成员国身份即可看出。英帝国本身的崩溃并非英帝国观念的消失；英联邦的现实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英国殖民政策的灵活性和可塑性。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任何一个帝国的诞生即孕育着它的解体。在近四百年的历史上，大英帝国的解体是持续缓慢的，有起有伏的，既有扩张中的萎缩，也有衰退中的复原。但二战以后的崩溃则是无可挽救的，其来势之迅猛，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任何其他历史事件难于比拟的。诚如克里斯托夫在其著作《处于顶峰期的大英帝国》中指出的：“由于半个世纪以来的非殖民化分解了最大的世界帝国之一，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了历史。”从这一页历史中，我们应该得到某种启示。

(责任编辑：姚玉民 刘光临)

〔作者李安山，1955年生，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讲师。〕

34
37
238
104
1280
18
1024
123
23040